

〔日〕尾形勇 著 张鹤泉 译

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

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丛刊



中华书局

〔日〕尾形勇 著 张鹤泉 译

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

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丛刊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 / (日)尾形勇著;张鹤泉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0.1

(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丛刊)

ISBN 978-7-101-07127-6

I. 中… II. ①尾…②张… III. 政治制度—中国—古代
IV. 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09)第 209235 号

书 名	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
著 者	〔日〕尾形勇
译 者	张鹤泉
丛 书 名	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丛刊
责任编辑	王 勖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 $\frac{1}{4}$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印 数	1-2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7127-6
定 价	46.00 元

中译本序一

林 剑 鸣

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家、日本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东京大学教授尾形勇博士的名作《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已由中国学者张鹤泉先生译成中文，即将同中国读者见面。这无疑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又由于作者和译者都是我的朋友，所以当张鹤泉先生嘱笔者为此书中文版作序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作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的会长和尾形勇教授的老朋友，我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事。

不过，当提起笔来开始完成这一任务的时候，才觉得这篇序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写。因为《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是尾形先生的一部力作。这部著作不仅在日本国内有巨大影响，对中国学者来说也并不陌生。我见到的不少中国古代史专家的书架上都有这部书的日文本，几年前的《中国史研究动态》上还专门对此书加以评介。该书的立论严谨、资料翔实、观点新颖，皆为中国史学家所钦佩。其中许多内容也被我国古代史研究者所吸取，例如笔者个人在《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出版）和《法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 年出

版)中,就曾不客气地将尾形先生的不少研究成果接受过来。而张鹤泉先生以其深厚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之功力和精通的日语水平,将这部名作译成中文出版,不仅对于更多的中国学者了解该书提供了方便,而且将会对促进中国学者吸取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而发展中国古代史的学术交流起很大的作用,这都是毫无疑问的。正因如此,为此书作序,更难以找到恰当的角度。踌躇的结果,最后决定还是从作者和译者同我的交往写起,这多少也可以反映出中日史学界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至于本书的内容,则留待读者自己去看。

尾形勇教授和我初次见面,是在1985年春末夏初的东京。记得那是一个小雨的日子,日本关西大学著名教授大庭脩博士陪同我,专门从大阪乘新干线火车到东京拜访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一些朋友。在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里,和这位心仪已久的朋友见面。当时的激动心情,至今仍能回忆得起来,之所以如此激动,不仅是因为久仰尾形先生的大名,更重要的是早在此次会面之前,我们就已有过超过文字之交的友谊:那是在中国的“四人帮”统治垮台之前,当时我的老师陈直先生尚处于被专政的地位,处境十分困难。不仅学术研究无法进行,生活都相当窘迫,以为数不多的工资,来维持盲儿、跛媳、稚孙的四口之家,使得年迈古稀的陈先生不得不亲自操持家务,负起买煤、买粮之类早已力不胜任的琐务。最令人寒心的则是,这一代大师数十年研究成果——近三百万字手稿,竟被诬为“毒品”、“垃圾”,几次都差一点被付之一炬,幸赖陈先生自己精心保护,东藏西塞,才得以保存下来。这里,尾形勇先生在支持陈直先生保存手稿一事上起过连他本人都未曾想到过的作用。事情是这样:当陈直处境最困难之时,国内学术界几乎和他断绝了一切往来,但远在东瀛的日本,却有两位学者常常给陈直写信,这两位就是关西大学的大庭脩教授和东京大学的西嶋定生教授。而尾形勇先生是西嶋先生的得意门生,当时任山梨大学教授,也因西嶋先生的关系常给陈直先生来信。那时中、日往来信件虽异常困难,但因其内容均为研究古代史方面的学术问题,所以几经周折也都能使对方收到。就是这些信在凄风苦雨中给备受艰辛的陈直带来勇气,使得他自己认识到自身及

其研究成果的价值,才在濒于绝望之际坚持下来。因此,在1980年陈直先生弥留之际,在交待给我办的几件事中,有一件就是向西嶋先生转送陈直自己历尽艰险保存下来,又亲手装裱好的几幅汉代瓦当拓片,向尾形勇先生转送陈直亲自题名的《史记新证》,以表示发自内心的感激。陈直先生是极其内向的学者,同辈人中在世的学者亦无几人。所以在此之前很少提及这方面的事情,亦不轻易流露出对日本友人的感谢之情。只是在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之时,才把这几件注入全部情感的纪念品,郑重其事地交到我的手里,并叮嘱我定要亲手送到西嶋定生和尾形勇先生的面前。此时,作为追随陈直多年的私淑弟子,也才第一次得知陈先生对日本学者的友情有多深!这样,尾形勇教授对陈直先生执弟子礼,以门生自居,我也从此视尾形先生为师兄弟,开始了神交。正是由于早有了这一段精神上的交流,所以当1985年在东京大学见到尾形勇先生的时候,真是一见如故。不过,那次在东洋史研究室,尾形先生还要安排我给他的学生讲课——现在这些学生也都成了秦汉史专家,所以未及深谈。次日,尾形先生陪西嶋先生——还有一位太田有子——专程到旅馆来看我,我才把五年前陈直交给我的书、拓片等物送给西嶋和尾形两位先生。至此也了结了陈直先生的生前宿愿,也可报慰陈直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以上就是尾形勇教授同我见面的前前后后。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写出这段往事,是因为这件事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尾形、西嶋、大庭先生和陈直及区区之间个人的交情,而是中国和日本学术界长期的友谊缩影,尽管在那极其昏暗的日子里,这种友谊也在人民群众中保持着,这股潜流始终维系着中、日学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条件一旦成熟时,就很快地发展成目前这样程度。

再次见到尾形勇先生时,是1986年在安徽召开的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三次年会上。尾形勇教授参加日本秦汉史学者代表团来中国,并在会上做了极精彩的发言。从此,中国的大多数秦汉史学者都认识了这位著名的东洋史专家。而尾形先生的著作也从此为更多的中国学者所了解。在此前后,尾形先生多次来中国,渐渐成为一位名符其实的“中国通”。他的中文不仅达到能读、能引用

中国古书的程度,而且对中国的风土、人情、民俗、俚语的了解都在短期内达到惊人的水平。所以,当1988年尾形勇教授率日本秦汉史学者再次来中国参加第四次中国秦汉史年会时,他可以面无愧色地声言对我国学术界的情况“了如指掌”了。

这种了解,自然不仅仅是语言上的沟通,更重要的是在其间尾形先生做了大量的学术交流的工作。譬如他曾通过各种形式向日本史学界介绍中国史学界研究情况,也多次向国内史学家介绍日本和港、台学者研究情况,更值得一提的是自1985年大庭脩、尾形勇、福井重雅、舩山明等先生参加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归国之后,就立即组织日本国内的秦汉史研究会。其目的之一就是增强与中国秦汉史学者的学术交流。经过尾形、大庭等先生的努力筹备,终于在1989年10月成立了日本的秦汉史研究会。由大庭脩教授任会长,尾形勇先生任副会长。我和安作璋教授、葛剑雄副教授有幸参加了在大阪举行的秦汉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代表中国学者致贺。这一历史性的场面,应永远载入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册中。而推进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功绩,尤其是推动中、日两国秦汉史研究交流的尾形勇先生的作用是不可抹煞的。

现在,尾形先生的代表作即将用中文在中国出版,这应是秦汉史方面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里程碑,在这里里程碑即将矗起之际,回忆我自己与尾形先生的交往历程,恐怕不是多余的吧。

最后,还应再次感谢张鹤泉先生,为介绍日本著名学者的著名著作所做的努力,也感谢他使我有机会在此表达我对日本友人深切的怀念。愿中国和日本学者的友谊世代保持下去,让学术交流之树万古长青。

一九九〇年五月十日于北京

中译本序二

王子今

“家”与“国”，是中国传统社会千百年来形态相对稳定的社会构成和政治构成。中国古代的帝制时期，究竟是依靠什么政治方式在许多年代施行了比较成功的管理，实现了相对安定的形势？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也许分析中国古代“家”与国家的存在形式，说明中国古代“家”与国家的相互关系，是十分必要的。我们通过对中国古代“家”与国家的考察，由此认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阶层与社会结构的情状，认识国家对社会基层之“家”的控制方式，以及作为普通的“家”的成员的民众个体的国家观念，将有益于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若干特质。

对这一研究专题有显著推进的尾形勇教授的《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一书，承张鹤泉教授翻译，中译本于1993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史学界形成了积极的影响。

《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牧野之誓：“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

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今予发维共行天之罚。”《后汉书·文苑列传上·崔琦》所见传主《外戚箴》：“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礼，而竞奖以权。先笑后号，卒以辱残，家国泯绝，宗庙烧燔。末嬉丧夏，褒姒毙周，姐己亡殷，赵灵沙丘。戚姬人豕，吕宗以败。陈后作巫，卒死于外。霍欲鴆子，身乃罹废。”所谓“昏弃其家国”，是对执政者的指责。“家国泯绝”，则指出了败亡的严重后果。前者“昏弃其家国”与“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遗其王父母弟不用”连说，后者“家国泯绝”与“宗庙烧燔”并列，都是发人深思的。这里所谓“家国”，可以看作君王之“家”即君王之“国”的例证。如果简单化地以这种认识也就是尾形勇教授所谓“家族国家论”或“家族国家观”解说中国古代国家的政治结构，显然不能完整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形式的内在特质。

尾形勇教授辛苦著书所探讨的，是这样的问题：“古代中国的皇帝统治是通过一种怎样的‘形式’具体化的？是在一种怎样的‘结构’中得以维持的？”（《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前言）读《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是可以使我们的认识得以深化的。

自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十余年间，尾形勇教授思考这样的问题，完成了《汉代的“姓”和身份——关于中国古代奴婢制的一考察》、《汉代的“臣某”形式——古代帝国的君臣关系》、《良贱制的发展及其特征》、《汉唐间的“家人之礼”》、《汉唐间的“殊礼”》、《汉代的“家人”和君臣关系》、《“汉家”的意义和构造——中国古代的父家长制的秩序和国家秩序》、《汉代的“天下一家”》、《中国古代帝位的继承——其正当化的过程和理论》、《皇帝的自称形式和即位礼仪——以王朝更替时期的情况为中心》等重要论文。这些论文成为《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一书的学术基础。

《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十分重视政治称谓的分析和说明。如“臣”、“民”、“天子”、“皇帝”、“家”、“家人”、“国家”、“公家”、“官家”、“汉家”、“汉氏”等等，对于其原始语义、社会位置以及文化意义，都有所探究。通过对这些概念的解释，使读者对当时社会生活的面貌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比如，关于“国家”，

尾形勇教授指出,“‘国家’一词,在周代,是指周室以及诸公室”。“这种‘国家’,或‘国’和‘家’,由秦汉帝国的建立而被统一起来,从而出现了排他地把‘公’权集于一身的‘皇帝’”。尾形勇教授又并不赞同“这时的‘国家’一语”,是指“‘公’的统治机构的总体”的意见。他说,“‘国家’不是直接指帝国本身的。这一点,从诸侯王以及他们的封土被记载为‘国家’的事例中,可以得知”。“‘国家’一词,与‘公家’、‘官家’等词语处于同列、同系统的位置。其本义,仍然指‘帝室’”。

不过,有些历史文化存在有复杂的内涵。事实可能又确实如尾形勇教授所说,“‘国家’、‘公家’、‘官家’、‘皇家’、‘天家’、‘大家’等词语,既沿袭了先秦的传统,同时,也有一部分是新创造的,并发挥了现实的作用”。例如,有的历史迹象似乎又说明当时的“国家”一语,有时又确实可以发现接近“‘公’的统治机构的总体”的涵义。如贾谊《过秦论》:“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对宋义的指责:“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史记·高祖本纪》写刘邦登基事:“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阳。”又说:“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汉文帝说:“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大体。”又如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五行》:“……则乐,乐则有德。有德则国家与〈兴〉□□□。”(200)“乐而简(后)有(德),有德而国家与〈兴〉。国家与〈兴〉者,言天下之与〈兴〉仁义也……。”(287)

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十六经》中的《五正》、《姓争》、《兵容》、《三禁》、《本伐》、《前道》等篇,都说到“国家”。中山怀王墓出土《文子》中,“国家”字样连续出现5次。汉代镜铭中所见“国家”,已经出现在确定语式中。比较典型的文例如湖北洪湖黄莲乡1979年出土汉镜有这样的铭文:“李氏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孰长保二亲得天力。”在有的镜铭中,相近文例却有另外的词句,如《金索》金六·四〇六“龙氏镜”:“龙氏作竟四夷服多贺君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孰蒙禄食长保二亲子孙力得天福。”

又如湖北沔阳出土汉镜：“龙氏作竟四夷服多贺君家人民息胡羌捺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官位尊显蒙禄食长保二亲乐无已。”

句式大体相同的镜铭中，“国家”可以变换为“君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汉代铜镜应用于极广泛的民众社会生活。看来在汉代一般人的意识中，“君家”往往就是“国家”。或许即如尾形勇教授所说，“‘国家’一词，有时也指皇帝个人”。

另一与政治称谓有关的文化现象，是“汉朝”一语的发生。

对于“汉朝”以前的周、秦政治实体，似乎直至汉末，并没有出现与“汉朝”相当的“周朝”与“秦朝”称谓。汉代文献中未见“商朝”的说法。对于夏王朝，司马迁曾经有称之为“夏朝”的情形。《史记·夏本纪》：“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司马迁笔下的“夏朝”，应是使用了汉代通行称谓，并不是先秦时期出现的政治代号。“夏朝”之说，也许与当时人称汉王朝为“汉朝”的语言习惯有一定关系。

大致在汉武帝时代以后，出现了指代汉王朝的“汉朝”称谓。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螭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官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这里所谓“汉朝”，是指汉帝之朝，即汉王朝中央政府。《汉书·楚元王传》载录了刘歆关于儒学源流的一段言论，其中说到“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涉及汉文帝时代的文化形势。所谓“汉朝”，也应当是指汉王朝中央权力机构。

《汉书·高五王传》赞曰：“时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众官，如汉朝，汉独为置丞相。”这里明确可以看到，“汉朝”是和“诸侯”对应的概念。又如《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汉书·王吉传》：“昌邑群臣坐在国时不举奏王罪过，令汉朝不闻知，又不能辅道，陷王大恶，皆下狱诛。”也是同样的情形。

我们读《汉书·楚元王传》，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太夫人与窦太后有亲，惩山东之寇，求留京师，诏许之。富子辟强等四人供养，仕于朝。”颜师古注：“四子以在京师供养其祖母，故仕于汉朝也。”这一意义的“汉朝”，是可以称作“朝”的。《礼记·曲礼下》说：“在朝言朝。”郑玄注：“朝，谓君臣谋政事之处也。”“汉朝”的初义，应当就是汉“君臣谋政事”的朝廷。

据《汉书·匡衡传》，匡衡为平原文学，长安令杨兴荐之于车骑将军史高：“平原文学匡衡材智有余，经学绝伦，但以无阶朝廷，故随牒在远方。将军诚召置莫府，学士歛然归仁，与参事议，观其所有，贡之朝廷，必为国器，以此显示众庶，名流于世。”杨兴所言，两次说到“朝廷”：“无阶朝廷”，“贡之朝廷”。《后汉书·儒林列传·谢该》记载，孔融说：“楚人止孙卿之去国，汉朝追匡衡于平原，尊儒贵学，惜失贤也。”孔融此所谓“汉朝”，是指西汉王朝统治中枢“朝廷”。《论衡·道虚》说东方朔“游宦汉朝”，有的注家就解释为“到汉朝朝廷做官”（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2册第428页）。又《论衡·乱龙》：“子骏，汉朝智囊，笔墨渊海。”《论衡·自然》：“曹参为相”，“汉朝无事”。其中的“汉朝”也可以作同样的解释。《论衡·对作》：“汉家极笔墨之林，书论之造，汉家尤多。阳成子张作《乐》，杨子云造《玄》，二经发于台下，读于阙掖，卓绝惊耳，不述而作，材疑圣人，而汉朝不讥。……”

“汉朝”这一辞义的使用，两汉历史文献中颇多记录。然而仔细考察其内涵，又可以发现这一称谓有时又有指代“国家”的涵义。

《汉书·地理志下》：“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文中所谓“贵显汉朝”，可以理解为“贵显”于汉“君臣谋政事”的朝廷，也可以理解为“贵显”于词义与“汉国”等同的“汉朝”。又《汉书·贾谊传》：“乃拜谊为梁怀王太傅。怀王，上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谊傅之，数问以得失。”颜师古注：“汉朝问以国家之事。”这里所谓“汉朝”，涵义似已有双重成分，其中包括与“国家”相近的语义。《汉书·邹阳传》记载邹阳奏书吴王刘濞，说道：“高皇帝烧栈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东驰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则章邯以亡其城，陆击则荆

王以失其地，此皆国家之无几者也。”颜师古注：“应劭曰：‘言不可庶几也。’李奇曰：‘不但几微，乃著见也。或曰几，危也。此数事于国家皆无危险之虑也。’师古曰：‘言汉朝之安，诸侯不当妄起邪意。应说是也。’”颜师古的认识，已经将“国家”理解为“汉朝”。

据《汉书·翟方进传》，王莽面对武装反抗，“于是依《周书》作《大诰》”。其中写道：“熙！为我孺子之故，予惟赵、傅、丁、董之乱，遏绝继嗣，变剥適庶，危乱汉朝，以成三阨，队极厥命。乌虜！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予不敢僭上帝命。天休于安帝室，兴我汉国，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况亦惟卜用！”这段文字应是根据正式文书档案存录，并非班固所拟撰。其中所谓“危乱汉朝”的“汉朝”，应当已经是整个政权和国家的代号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汉朝”与下文的“汉国”，其实有相近的涵义。《汉书·萧望之传》：“朝无争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显然，在这里“朝”与“国”的关系，一如“争臣”与“达士”的关系，“知过”与“闻善”的关系。

《后汉书·应劭传》记录了应劭关于乌桓与鲜卑问题的一段议论：“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无君长之帅，庐落之居，而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计获事足，旋踵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内，盖为此也。”李贤注：“朝家犹国家也。《公羊传》曰‘《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也。”“朝家犹国家”的解说，便于我们体会“汉朝”的涵义以及“汉朝”与“汉国”的关系。应劭语中所谓“中国”与所谓“朝家”，前者侧重地理意义，后者侧重政治意义，其对应关系也是明显的。《后汉书·东夷列传·夫余》写道：“其王葬用玉匣，汉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焉。”也体现了在外交关系中，在边疆民族问题中，“汉朝”常用以指代“汉”国家的情形。

《三国志·魏书·张既传》记载，凉州地方实力派张既去世，曹丕深表哀悼之意，“诏曰：‘昔荀桓子立勋翟土，晋侯赏以千室之邑；冯异输力汉朝，光武封其二子。故凉州刺史张既，能容民畜众，使群羌归土，可谓国之良臣。不幸薨陨，

朕甚愍之，其赐小子翁归爵关内侯。”通过“荀彧子”和“冯异”故事的叙述方式，可以看到“翟土”和“汉朝”的对照。而“群羌归土”、“国之良臣”云云，亦显示“汉朝”在这里是指代“汉”国家的。

现在看来，汉代文献中屡屡出现的“汉朝”，大概还可以为“朝”字补充词义，即相当于国家政权，有时语义亦接近于“国家”。

尾形勇教授讨论了“汉家”、“汉国”、“汉氏”、“汉朝”等概念，他说：“‘汉家’中包含着‘帝室’之意。”又指出，“‘汉家’意味着汉帝国，或汉王朝。因而，其特征与‘皇家’之类不同，与‘帝室’之意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而，我们又看到汉代自称“皇汉”的情形，与自称“大汉”、“强汉”所表现的国家意识是相同的。尾形勇教授又说：“‘汉家’一语，在西汉当时就存在。而其语义，……是能与‘汉朝’以及‘汉国’互相置换的。”这样的意见，以为“汉朝”和“汉国”往往可以“互相置换”，应当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以上这些议论，只是希望提醒年轻的中国读者，在尾形勇教授《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初版近30年之后，我们在钦佩作者对秦汉史的真知之余，也许还应当注意到尚存在推进相关研究的空间。至于30年来新出土考古文物资料中亦可发掘对于这一专题研究有价值的信息，也是没有疑问的。而对“臣妾”称谓以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显然已经促成了新的认识的形成。

《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张鹤泉教授中译本由中华书局再版，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者乃至更多的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在《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一书之后，尾形勇教授还有一些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论著问世。如《中国历史纪行》（角川选书，1993年），《历史学事典》第10卷《身份与共同体》（弘文堂，2003年），《世界历史》第2卷《中华文明的诞生》（与平势隆郎合著，中央公论社，1998年），《中国史》（与岸本美绪合编，山川出版社，1998年）等。译著则有与高本智见合译杨宽《中国都城的起源和发展》（学生社，1998年），与杉本宪司合编译王仲殊《三角缘神兽镜》（学生社，1992年）等。其中有创见的内容如果有中译本扩展其影响，应当也是学界幸事。

中译本序言

尊敬的张鹤泉先生要在中国翻译出版我的著作，写信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欣喜若狂，欣然应允了。作为一名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谁都会为享受此殊荣而高兴。

这次中译本的出版，至少为试图一瞥拙著的更多中国同仁提供了指出书中诸多缺陷以及提出有益批评的机会。仅从这个意义上，也必须对为这次中译本出版而尽力的张鹤泉先生以及有关的先生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从张鹤泉先生处得知，出版拙著的是在日本也相当知名的吉林文史出版社。这又是使我感到高兴的。因为该社的出版事业，尤其是连续发行的“历史反思丛书”，作为近年来少有的出版筹划，而受到日本史学家的欢迎。从该社出版的林剑鸣先生的大作《法与中国社会》中，使日本学界获益匪浅。

拙著的原型，是十多年前向东京大学提交的学位论文。我有幸以此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其后，在恩师西嶋定生先生（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的力荐下，由日本最富有传统的出版社岩波书店出版。拙著是纯粹的学术著作，从出版之日起，就在日本学术界受到意想不到的好评。今年十一月（1991年）承蒙岩波书店

的厚爱,得以再版。

无论在哪个国家,也不管理由如何,学术著作的出版都是十分困难的。我虽然并非熟知贵国的出版情况,但可以想象,在出版拙著中译本时,也是克服了诸多困难的。在这个意义上,谨对克服种种困难,使拙著得以问世的吉林文史出版社表示由衷的谢意。

去年夏天,我第十五次访华时,有机会到了长春。这是一座绿色掩映的美丽城市。我受到了当地诸位先生的热情接待,又有幸与畏友张鹤泉先生久别重逢。当时唯一感到遗憾的,那就是陈连庆先生的逝世,使我永远失去了拜见先生的机会。在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上,我曾聆听过先生的谆谆教诲。先生的学生张鹤泉先生苦心译出的拙著中译本出版,首先高兴的应该是陈连庆先生。然而,先生不及过目又是令人深感遗憾的。

最后,拙著承蒙我尊敬的学问上的先达、老朋友林剑鸣先生作序,深感荣幸之至。谨对林剑鸣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尾形勇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于东京大学文学部研究室

前 言

古代中国的皇帝统治,是通过一种怎样的“形式”具体化的?是在一种怎样的“结构”中得以维持的?这就是本书探讨的问题。

关于对古代国家权力的理解方式,许多论点值得参考。我们已经具有了种种共同的不容置疑的学说。尤其是战后,在日本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许多优秀成果。

本书的开头部分,专设一章回顾学说史和提出问题,接着,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历来的学说全都认为,“家族主义”是当时统治体制的支柱。因此,可以说,认为从“家族主义”方面寻求对古代帝国本质的理解,没有超出所谓的“家族国家论”的范围。而且,当再度对此加以探讨时,就会发现,这种“家族国家论”或“家族国家观”中,存在着许多不应该被继承下来的疑点和难点。

在古代史的发展过程中,“家”的作用是什么呢?本书在对此作出充分评价的同时,从克服原有的正统的通念上的“家族国家论”出发,设定了另一个目标,正是基于上述情况。即本书所采取的立场,并不是从普普通通的《……“家”与“国家”》这一本书的标题,可以轻易推测的。“通过‘家’论述国家”的方法,以及